《清代扬州及其腹地的盛衰，1644—1810》一文的绪论

（澳）安东尼娅·费南撰　张广学译

〔译者按：《清代扬州及其腹地的盛衰，1644——1810》（Prosperity and Decline under qing:Yangzhou and Its Hinterland,1644—1810）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安东尼娅·费南（Antonia Finnane）撰写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85年，正文十章，共约二十余万字。现将绪论译出，以供共清史学者参阅。〕

1928年，作家郁达夫从上海启程往游吴中几座大城。游览扬州是他此行的主要目标，扬州是座充满花园和梦幻的城市，没有哪个城市能象它那样“使人销魂”。历代诗人的溢美之词以及一千五百年来史家的著述给郁达夫贯输了诗意扬州的印象，寻访“六朝的金粉气”的愿望又重新在此涌现。他的希望落空了，甚至就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他所见到的景色“平坦萧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①对扬州城的名胜做竟日之游后，加重了他在路上的那种悲凉之感。寺庙亭台倾圮，园林荒芜。城中以树木花草假山石见胜的各家园林只剩下几处遗迹凄然孑立。惊愕与失望之余，郁达夫试图说明扬州衰落的因由，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兴修铁路从扬州之旁经过，从前作为大运河港口的扬州城如今已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辉。②

郁达夫这篇简短的游记说明，扬州城早已名不符实。他心目中的那座扬州城当是何炳棣笔下的盐商们③的栖息之所，或许是杜牧笔下“青楼”④所在的更加遥远的古代扬州。他看到的这座城已经荒凉冷落了，只是在赤贫的腹地相形之下，它才显得鹤立鸡群，扬州腹地的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屋窄陋”。⑤

作为昔日“南方文化”的缩影，“国内货殖的神经中枢”⑥的这座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郁达夫的解释，即使那篇游记的主题并不在此，触及到的重要之点是：兴建铁路无疑加重了条约口岸对扬州的不利影响，沿海贸易的发展以及清末以来大运河的逐渐废弃也都影响了扬州⑦。然而，归根到底，这些深刻的巨大变革只能说明扬州城为什么没有复苏，却不能说明扬州城为什么衰落。早在1912年津浦铁路兴建之前⑧，清政府于1901年⑨最后弃置大运河之前，据耶稣会士多米尼克·甘达的记载，1894年扬州城内数得上有身份的居民已非活跃的盐商、文人学士而是些退职的官僚⑩。他写到：“你仔细观察一下扬州城正中的这座塔形建筑。⑪它就是象征：它原本是扬州城的荣耀，它赋与当地的诗人以灵感，吸引着每一位从它身旁路过的人发出惊奇的目光。如今，它因受辱而满面愁容，只剩下一付骨架了，长毛（太平军）毁去了上面的所有装饰，三十年来连一个辨士的修葺费都没有花过”。⑫

太平军叛乱给此地造成的创伤直到那时想必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不足为怪的，因扬州城在1853——1864年之间曾数度被太平军和清军反复占据过⑬。然而，一当太平军招来了列强的进一步入侵，并导致清帝国的经济秩序一再变动，它本身无法说明它与扬州的衰落无

关。再把时间提前一些，1839年，服官的学者阮元(1764——1849年)在外地度过长期显宦生涯之后归老扬州。⑭他记载说，他几乎认不出他少年时代的扬州了，许多处园林和藏书楼都弃置不用，已成废墟。⑮然而，这只不过是证实了五年前他路过扬州时的见闻，当时他看到商人之家和学者们都已贫困不堪，潦倒的官僚转而操业经商，这些人都入不敷出。⑯

少小离家老大归的老年人难免有乡情怀旧之感，即便如此，阮元所记也清楚地表明，扬州城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了。在这方面，它显然不同于上海一类的城市，上海在近代的前夜已经逐渐发展起来。⑰看得很清楚，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早期的初变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激变，这些变化早在外来势力用武力强行造成、从而导致扬州长期萧条的那些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到来之前就已经给扬州带来不利的影响。郁达夫去扬州寻梦怕已迟了一个多世纪。

在城市的历史上都有着相类似的成长与衰落现象。斯吉奈尔观察到，在近代之前的中国这种现象与地区发展的周期息息相关，⑱而费尔南德·布劳代则在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实力之游”中把这种关系当做一种探索的方法，几乎实际考察过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全过程。⑲它犹如一出戏，有各种场面，演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人民拥向城市，又走出城市；享有特权的家族兴起又衰落；贸易和交通的诸般型式在不断变化；政权在更迭；自然景观的兴建与破坏；文化生活的发展与衰败。撰写这篇论文的最初动机就是想看一看在清代扬州上演的这出多场大戏。

但是，引证一座城市的历史真是头绪纷繁，谈何容易，而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尤其如此，其复杂性或许超过其它任何地方。劳伦斯·郎格抱怨过，基辅人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俄国城市缺乏纳税表册和户籍数字，⑳而中国的城市直到最近仍然如此，斯吉奈尔曾试图做些定量分析，他想方设法，诸如用猜想、推测和独创的方法来估计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的比率。㉑近代之前的人口数据，不论何种类型，㉒一般只载有城市所在的那个行政区（主要是县）的人口统计，而没有城市本身的人口统计。至于其它常用的有关城市成长与衰落的统计资料，诸如贸易额或资本积累比率等等直接的数据也一概缺如。

这个帝国比其它大多数文明国家拥有更多更大更古老的城市，在它的官方文献中出现如此惊人的疏漏乃是对城市在帝国所处地位的非议，特别是对人们所知道的城市地位的非议。城市的官方职能就是一个行政中心的职能，㉓而它的各种经济职能，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泉源的职能，几乎一直被主要靠田赋来维持的历代王朝所忽略。而当设置海关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没有对动产和企业投资征收税额的类似制度，举例来说，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㉔就实行过这种制度，从有关近代之前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残缺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离开统计数字，近代之前的城市轮廓必定是极为模糊的，即便是在记载详细的方志中也是如此，有关城市的细节不得不到记述县、州、府的大量文献中去着意搜寻，因为城市是县、州、府的行政中心。由于这个特点，原始资料中的城乡界限模糊不清，这就为撰写中国城市历史带来许多难题，因为无论是官方记载或私家评述都很少把中国城市当做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实体看待，正如渴望撰写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们所面临的那些难题一样，原始资料中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地缺乏私人信件和有关私人生活的记载，从而有碍于从别的角度而不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角度去再现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的著名的女人和男人们的生活。㉕这些原始资料又告诉人们：研究中国城市应从它的地理、经济和政治背景着手；对城市的解释，理解以及为它辨解应以城墙以外的状况和发展结果为依

据。似乎是绝妙的巧合，研究中国城市的过去一度成为风气时，在重写欧洲历史之际，“城市与乡村密切相联这一发现”㉖应当同时继续研究下去。

尽管过去二十年来已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相对来说，关于众多的中国城市和城市体制仍然所知甚少，城市历史学家在这个阶段得以获取的最重太的贡献或许只不过是开始探索远未探查过的地带，尽管大卫·布克以及近时的威廉·罗埃单单从历史角度各自撰写出《济南（山东）》和《汉口》两部令人赞佩的著作。㉗当然，扬州这座城市很难说是未曾探查过的地带。扬州在唐代享有盛名，在清代又重享，历史学家绝不可能忽略了它，㉘扬州长久以来就被涂以各种色彩，1928年满怀希望的郁达夫前往那里意欲一睹五颜六色的扬州旧观。扬州府，其实是整个淮南东部地区并非尽为人知，因此，在后面的几章中我把相当大的注意力用之于这块较大的土地上，这可算是开拓性的研究。

然而，在最基础的水平上开始考察与扬州生存相关的时间与空间因素时，就已证明：扬州城的繁荣与它所在的行政区经济上兴旺显然有着相应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城市所在的行政区与城市所影响的范围之间“相适应的程度”㉙，同时应当重新估价中国在近代之前城乡之间的联系纽带所起的作用。G·W·斯吉奈尔的那部重要著作㉚对清帝国经济和政治结构所做的分析乃是这方面最早的开拓之作。把一件个别的事例分毫不差地套入他那一般性的构想，存在着许多困难，无论如何，也已经引起疑问，他那颇有影响的全经济区域模式是否会违背格言，使人无法看树取材？

基于上面谈到的第二点，在各种有关文献中存在着的某种紧张状态也就无足轻重了。费孝通在《乡村、集镇与城市》中所作的分析对城墙以内的行政中心与其余地区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做出了最精确的论断。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城市乃是一座设防的集镇，目的在于保卫“统治阶级”，并且有着消费型的经济特点，这个特点在本质上脱离了集镇赖以兴旺的正常的贸易经济。㉛费氏的分析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他忽略了有一批城市显然在贸易经济以及为行政中心服务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次，正如学者们公认的那样，费氏观点惹人注目地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些人诸如马科思·韦伯、弗雷德里克·毛特及马尔克·埃立文都强调中国城市对乡村的依赖程度。㉜这种来自熟知中国城市的成长过程与欧洲城市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的观点，饱含着一种具有特殊文化的眼光（这当然是费氏自已的观点）。用这种眼光观察到的中国城市的特征已由舒三·曼㉝概括在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中，但其要点可归结为，是清帝国的统治方式（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和血缘关系以及其它跨过城乡之间的任何有效距离的社会纽带把城市与乡村联结在一起的。

就事论事，在这个问题上拿出某些结论性的说法是否有用，似乎颇可怀疑，但就问题的整体而言，最关紧要的是不断完善我们的认识，城市是怎样与其腹地联成一体的，又怎样与之分开的？扬州腹地、扬州与其腹地的关系以及左右这种关系的力量将是以下各章的中心课题。这里没有普遍适用的兰图，因为，即使在近代之前的中国有一种典型的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它也不是扬州。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尽全力寻求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政治因素与“自然”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普遍适用于中国城市的成长过程。

本文除开头的那一章叙述扬州城的早期历史外，主要集中探讨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亦即满洲入主中原后扬州及其腹地从兴起到开始衰落的过程。虽然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探讨清代后期扬州的历程，那时该城由于各种摸得到的原因已经衰败不堪，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涌现出许多线索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扬州城的重要地位后来为什么大为削弱。

①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载《郁达夫游记》，上海杂志公司，上海，1948年，171页。（郁氏原文引自上海书店1980年版《郁达夫游记》，121—122页。——译者）

②同上，177页。（郁氏原文为："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同上，126页。——译者）

③见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之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17期（1954年6月），130—168页。

④"青楼"即妓院，见杜牧遣怀诗，全诗译文见格拉汉《晚唐诗》，企鹅丛书，1965年，第123页。

⑤王寨韩《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之研究》，载《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5期。台北，1977，第22866页。

⑥赛拉斯·吴《通向权力之路：康熙与其太子，1661—1722》，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第5页。

⑦十九世纪后期扬州贸易额的减少反映在关税收入的降低上，而扬州一度曾是关税收入很高的港口，1886—1889年这四年间每年关税收入平均低于四万五千两：见《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73年，第三卷，93页，531页；第四卷，86页，838页。这个数字不及1735年关税总额的四分之一（见本文表8.1），虽然税法有所变更对此也有影响，特别是奢侈品已由外国船只载运，此外，上海已经成为条约口岸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材料来源同上。每况愈下的大运河为扬州这个转运港口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

⑧这条铁路大致与大运河平行，穿过江苏中部，再穿过安徽。见M.C.徐，《中国铁路问题》，1915年初刊，1968年重刊，纽约，A.M.S出版社，第135页及其后，第16页载图。

⑨这一年，航行在大运河上的最后一批漕运船只未能顺利通过，从此漕运停止使用大运河：辛顿《1845—1911年中国的漕运制度》，哈佛出版社，1956年，第99页。

⑩甘达《帝国大运河：运河的历史与记载》，载《汉学研究文集》，第4期，上海，1894,第62页。

⑪，这座建筑物大约是文昌阁，此阁至迟建于万历（1583——1620年）年间：扬州府志（1810年修）三十一卷十七页，此阁雄伟高大，从前它雄居于流经扬州城西部的运河之旁,如今俯临代替运河的南北大道。〔译者按：原注有误，作者把扬州城的三座高层塔形建筑物文昌阁、文峰塔和四望亭混为一谈了。文峰塔在扬州南门外官河之旁，文昌阁在扬州城北，建于万历十三年，四望亭在扬州城西门街,横跨街道，太平军占领扬州时曾作为瞭望台使用。据《中国名胜词典》，331页。〕

⑫甘达，同注⑩。

⑬太平军于1853年4月至12月占据扬州九个月，后又于1856年4月及1858年10月两度重占，时间均不长。然而，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动一直持续到1864年。见周村《太平军在扬州》，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57年，6——26页多处。

⑭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美国国家出版局，1943，399—402页。

⑮阮元《擘经室再续集》，约刊于1844年，第三卷，第六页。（此书与作者的另一著作《擘经室集》合刊在一起，未注明年月）。

⑯同上，第三卷第六页。

⑰作为贸易港口的上海在清代中叶兴起的情况，见马尔克·埃立文《集镇与水路交通》，载斯吉奈尔编《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467—69页。

⑱斯吉奈尔《绪论，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载《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16—17页。

⑲费尔南德·布劳代《世界的前景》，伦敦，1984年，89—276页。

⑳劳伦斯·郎格《中世纪的俄国集镇》，载汉姆编《俄国历史上的城市》,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第13页。

㉑斯吉奈尔《中国十九世纪区域性城市化》，载《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211—249页。

㉒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第一至四章多处。

（下转第54页）

爆发。最令人感兴趣和内容丰富的章节之一，是作者扩大了鸦片战争的研究范围：从婴粟的种植到鸦片在英属印度对中国贸易的准备过程。虽然该书以英国的观点写成的，但是并未在世界整体中把鸦片战争呈现出来。

由于大部分美国学者都藐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所以，以往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巴素则主张把鸦片战争放入一个较大的世界整体观来研究，即把它放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内部问题中来探讨，指出在西方挑战开始颠复中国的传统平衡状态、巨大的人口增加所引起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下，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正经历着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猖獗的盗匪和各种犯罪活动及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上述问题如何影响到清政府处理鸦片危机呢？中国内部的危机和鸦片消费量的增加有何关系？为何鸦片吸食日益普遍，尤其是在绅士和政府官员中尤甚？其它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还有：国内鸦片走私网和它们与秘密社会、匪党等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关系，律法的发展所涉及走私、鸦片吸食和政府的腐败，及律法如何有效地施行、鸦片贸易影响到区域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和其它有鸦片走私网的内地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内容是关于对哈佛学派在鸦片战争研究方面的模式及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它提出的挑战的简要概述，希望能对中国学者有所裨益。

---

①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是指中国人以本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即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和文明之邦，其它国家则系蛮夷小邦。

（上接第45页）

㉓我在此处遵循弗雷德里克·毛特对"城市"一词的解释，"城市即中央政府派驻负有治理之责的武装人员的地方"，见毛特《1350——1400年南京的演变》，载《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107页．城市化的地方当然包括一大批不设官衙的城镇，对这类城镇，我使用"镇"或"集镇"这两个词以资区别。

㉔见大卫·何里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城的住户与财产》，载《中世纪城市》，米斯吉敏，何里希，乌德维奇编，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4—7页。

㉕见王庚武《谋反的改革者与近代中国人传记》，载王庚武编《自身与传记：亚洲的个人与社会论文集》，悉尼大学出版社，1975，186—89页。

㉖菲利普·阿勃拉姆斯，《绪论》，载菲利普·阿勃拉姆斯、瑞格雷编《各种社会的集镇：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6页。

㉗大卫·布克《中国城市的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局变幻与城市发展》，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威廉·罗埃《汉口：1796——1889年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

㉘见第1章引用的有关著作。

㉙斯吉奈尔的话见所著《城市与地方体系》，载《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第346页。

㉚主要见《城市与地方体系》，275—351页，另见作者的另一著作《地区性的城市化》，211—249页。

㉛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95—99页。

㉜见马科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年，1227—28页；弗雷德里克·毛特《南京的演变》，101—110页；马尔克·埃立文《宋朝以来的中国城市》，载阿勃拉姆斯，瑞格雷编《各种社会的集镇》，87—88页。

㉝舒三·曼《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性变革》，载《现代中国》，10／1，（1984年1月），89—90页。